

落叶满空山

——忆父亲徐义生

○徐大元 口述 谢喆平 整理



一九三三年，病愈后的徐义生摄于清华宿舍

我的父亲徐义生1909年12月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焦溪镇，家里是做粮食生意的。他自小聪慧，学习成绩优异。12岁时考入江苏省立第五中学（今称江苏省常州中学）。1925年他16岁，中学要毕业的时候，由于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当地的大学都停止招生了。在长辈的建议下，他到北京考取了北京大学预科。在北大预科的两年，他接触到很多爱读书、不怎么参加政治活动的朋友，兴趣慢慢从理工转到了文法。临毕业时传来消息，说北大要改组为京师大学堂，由张作霖派校长。他觉得在那些封建军阀的统治下，北大的前途可想而知，就决心到清华大学去。

一、清华

当时清华大学的办学经费来自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学生的学费毕业时全部返

还。父亲1927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是第三级学生。进清华后，家中发生变故，经济情况急剧下降。父亲只好靠课余翻译稿件挣稿费来继续学业，还拿到了学校的奖学金。

清华读书风气很盛，学生求知态度认真。由于和美国的亲密关系，清华学生比较活泼，作风洋派。课外活动一直受到美国学校的影响，蓬勃发展，多彩多姿。清华把读书叫“开矿”，健身打球叫“斗牛”，重视体育等各种活动，培养健康快乐、有创造力与领导力的学生。在清华上学期间，父亲对太极拳、昆曲、笛子、书法、篆刻都有一定的造诣。

清华学生大多数都是“一本正经”地读书。读书环境的得来不易和对国家的责任，使多数人都都不妄自菲薄，不浪费光阴。当时政治学系的课程偏重西方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国际公法、国际关系等方面，教材多用外文书籍，中国的较少。学生需努力以赴，否则过不了关。

因为课业重、要求严、淘汰率高，清华学生的学业水平比较整齐。经过近四年刻苦学习，毕业的最后一学期，父亲感染了阿米巴病疾，在清华医院躺了整整十个月，1931年底才出院，但仍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保送本校研究生。

当时清华研究院对研究生的挑选极为严格，即使是陈省身先生，也是南开大学

□ 怀念师友

毕业在清华当了一年助教后才考入的。在研究院，父亲的导师主要是政治学系的张奚若先生和钱端升先生。当时清华教师年龄比较轻，大多受过西方教育，不但汇通古今，还汇通中西、汇通文理。他们大多认真教学、勤于研究、引导学生，形成了良好的学术环境。他们也关心社会，发表言论，促进社会和政治改革。这时期清华的教师阵容也比前期开放，成了一个有国际学术地位的学府。

二、留学

1933年，清华大学恢复公费留美招生。同年8月，父亲参加了选拔考试，考取了民国二十二年度（1933年）的留学名额，专研公共行政，成为清华大学（新制）的第一届留美公费生。

1934年1月，父亲乘船去美国。那时的美国正是在经济大危机之后，罗斯福上台实行新政。他先在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了一学期，觉得哈佛的空气太保守，当时比较进步的学者们大多在纽约，于是就转

学到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

父亲在哥大研究院学习了两年，学满学分，获得硕士学位。因为清华公费还有半年，他又转到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了半年，为的是听英国政治学者洛克（Locke）的课——当时认为洛克是比较进步的学者。他到英国几个月后，清华公费满期，他就启程回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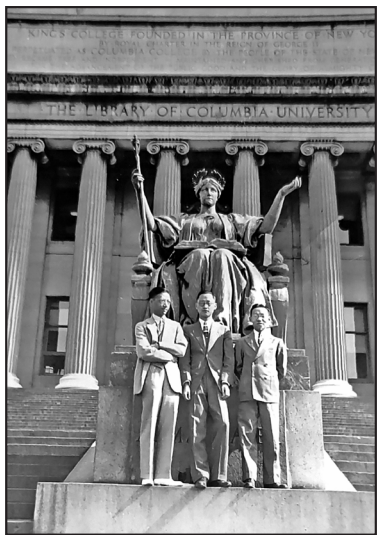
当时，苏联新宪法草案刚公布，得到英国进步学者们的一致赞扬，所以父亲回国时决定参观法国、比利时、瑞士、德国和苏联，从西伯利亚回国。1937年的2月他回到北京，但是接到了祖母得病、要他马上回家的消息。

三、中研院

父亲回江苏老家后，接到清华导师张奚若先生来信，约他回清华任教。但当时祖母病在床上，希望儿子能离家近些。恰好那时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社会调查所新添了研究行政组，钱端升先生就把父亲介绍给所长陶孟和先生。1937年4月，父亲进所工作，担任副研究员。陶孟和先生在学术界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对年轻人放手扶持，深得研究人员的尊重。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中央研究院就开始了向后方的大搬迁。父亲当时单身年轻，负责押运图书资料。8月中到长沙，9月搬到湖南衡山南岳圣经学院。1938年由衡山南岳再迁至广西桂林阳朔中央研究院办事处，在这期间，他参加了学术组织“广西建设研究会”。他在广西的一年里进行了广西省的行政研究，到各县去收集资料。

1939年1月，社会调查所又迁往昆明。当时西南联大也设在昆明，张奚若先



一九三六年夏，徐义生（右）与好友曾炳钧（左，一九二九届政治）、黄文熙（一九三三届）于哥伦比亚大学

生和钱端升先生邀请父亲在西南联大兼中国地方制度课程教学。陈省身先生从法国回国后也在西南联大任教，与父亲等一批单身教师常在一起打桥牌。1939年7月的暑假，父亲到上海结婚，对象是上海沪江大学教育系毕业的我母亲黄湘君，陈先生随行。

外公黄首民（1890—1976）是浙江湖州人，早年参加革命党。辛亥革命时他是督战员、黄兴的卫队长，由于追求有文化又漂亮的我外婆，被约法三章，不准做官——怕他娶小老婆。在跟黄兴去南京出席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大典的船上，他向黄兴表示不要做官，想去读书。他带黄兴的信去见孙中山，孙中山连声夸奖：“年轻人不要做官，要读书，好！好！”他中学学的是英语，就安排他以革命党退伍军官的退职金去了美国南部半工半读学农。当时美国经济一片繁荣，外公眼里美国什么都好。回国后他们学农的大多转了行，外公给荣家上海纺织厂当了多年的总经理，以后又开办了我国第一家机械化的泰山砖瓦股份公司并任总经理。外公说他“衣食住行”就差没有来得及搞“行”了。

外公总是夸父亲聪明，翁婿关系很好。母亲当时受到外公影响，非美国留学生不嫁，通过她表姐夫王家辑（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介绍，嫁给了我父亲。她说父亲脾气好、人好。婚后，她放弃了上海明德女中的教职，与父亲经香港、越南海防到昆明。

当时昆明经常被日军飞机轰炸，不得不常去跑警报。从城里搬到乡下后父亲专心整理他在广西调查搜集的资料，写成《广西省县行政关系》一书。1940年冬



徐义生（前排右1）在桂林中央研究院办事处与同事合影

天，所里要迁往四川李庄，那时我母亲刚生了大姐要照顾，陶所长让父亲在昆明负责收尾工作，1941年7月才到达四川宜宾李庄的石崖湾。

当时的李庄是全国学术研究最活跃的地点之一，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担任社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文字研究所（傅斯年担任所长）、同济大学都已在此地。父亲在李庄期间，多次到四川各县和成都去进行社会调查，目睹了四川农村农民抗战中的沉重负担和被拉壮丁的凄惨现实。他在李庄还参与了“中国人文科学社”和“中国经济建设研究会”等学术团体，撰写了《抗战建国与地方自治》及《行政委任的问题》等文章，并于1943年晋升为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在陶孟和和所长不在李庄期间，他与1949年后在中山大学任教的明代赋税史专家梁方仲先生先后担任社会科学研究所代所长。

1946年10月，社会所从李庄回到南京。1947年，他在南京中央大学法学系兼任教授，讲行政法，很同情因为“反饥饿”游行而被迫害的同学们。后来所里派父亲到上海进行善后救济的行政制度研究——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1948年出版了

□ 怀念师友

父亲的《善后救济工作的行政制度》。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不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也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关贸总协定的创始国，应该是和平建国的极好时机。父亲和大多数清华政治学系毕业生一样，所学所教多是西方现代政治学知识和理念，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信念是“为学术的使命而生存”。当时，他们希望能建立联合政府或按美国调和方案：国民党和共产党一个执政党、一个在野党，互相监督，和平竞争。这一时期，他写了《中国新宪法》等文章。

父亲是相信改良主义的，他总是在问：为什么现在总是说革命，不说改良？他当时认为北欧的改良主义是最成功的，社会代价最低，人民福利最好。但中国长期封建专制制度的国情，国民受教育程度低，不能接受西方的民主思想。国共两党终于还是发生了大规模内战。人民希望和平，厌恶腐败，怨声载道。国民经济不支持战争，战争的巨大开支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经济崩溃。人民解放军取得大规模胜利，国民政府终于大溃败。

1948年临解放前，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坚决要去台湾，多次催促陶孟和先生把社会科学研究所搬台湾，但是陶先生仅将旧报纸冒充图书资料装箱运台，坚决不走。

四、1949年后

1949年南京解放后，父亲仍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当研究员。1950年7月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担任专任研究员，并在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当兼职教授。他与其他研究人员一起，调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期间还听了毛

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同志的讲课。在南京时他还向紫金山天文台的研究人员李元先生等学习了一些天文知识，当时大家都住在南京成贤街92号。

1952年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院系调整，将欧美体系全部改为苏联体系。清华大学的文理科大部分并入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以也改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陶孟和副院长从兼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以所长改为兼任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长。

在院系调整中，人事部门征求父亲意见，将他调往北京政法学院，可保留原职称和待遇——当时钱端升先生是北京政法学院院长。他带的研究生罗典荣先生去了北京政法学院，“反右”运动中被打为右派分子，改革开放后成为我国著名环境法专家。父亲通过到革大的学习和考虑政治学被取缔的现状，选择了留在经济研究所，改行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职称也从二级专任研究员调整为七级，1956年又回调二级。他拒绝了人事部门提出可以领取每月480元的保留工资的建议，决定定他什么级他拿什么钱，还经常说领取保留工资是“鸭屎臭”。他把从国外带回来的多箱西方政治学原版书籍赠送给了北京政法学院。

父亲转入经济史研究，参加了俄语学习班，1953年与其他同志一起翻译了《苏联经济的工业配置》一书，与严中平等同志一起编写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1955年8月科学出版社出版），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第一种，他承担了其中商埠、租界、租借地章节的撰写工作。由于精通英、法、德、日、俄等多门外语，又有深

厚的古文字功底，父亲在经济所主要负责中国近代外债史和部分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1956年他在《经济研究》期刊上连载了《清政府的外债》。196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一书。197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丁名楠先生主编的《帝国主义侵华史》也引用了该书数据。

当时，因为国民政府外债资料都被运到台湾去了，外债研究工作没法继续，父亲提出研究内债和公债，但是没有得到同意。

1961年8月，父亲调到安徽大学政治系，教“中国近代经济史”。1965年，政治系搬到安徽劳动大学，因为年岁较大，父亲留在了安徽大学马列教研室当教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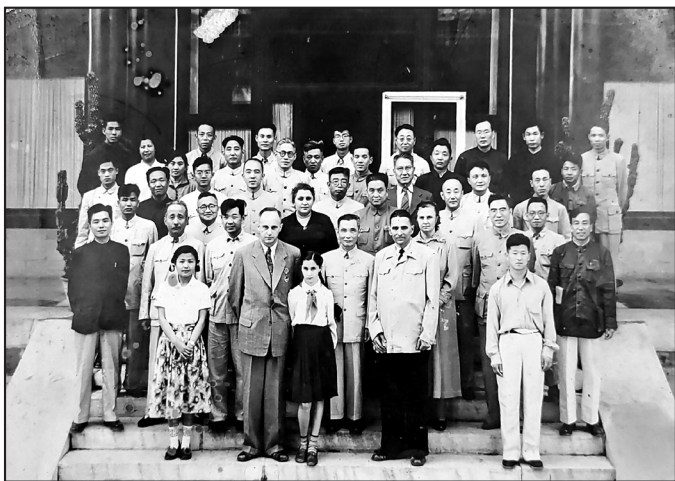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父亲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判。他曾经不堪凌辱想自杀，但是被母亲开导和制止了。在劳改队经受了繁重的劳动和“斗批改”

后，1969年9月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安排到了安徽大学图书馆工作。在图书馆工作期间，父亲为人谦和，做事认真，责任心强，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

1979年，父亲在第4期《安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关于楚相孙叔敖的期思陂和芍陂》。1982—1983年，父亲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会科学编辑部的邀请，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清史部分选写“外债”“外国在华洋行”“商埠”“租界”等条目；为经济学卷撰写“近代中国的外债”“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庚子赔款”“善后大借款”“国际银行团”等条目。他还为改革开放编写了《1840年后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外国公司名录》（未出版）。

1983年，美国民间部分湖广铁路债券持有者提出要求偿还债券本息，并在美国阿拉巴马州法院立案。由于这个案子，中央对旧中国的外债问题非常重视。父亲向

中央陈述，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美国人以很低的价格从德国持有者手中购买的，无权要求我国偿还本息；再说旧中国外债至少650笔，本金总额61亿元（以上世纪30年代初通用银元为准），加上一百多年的利息，决不能开赔偿先例，否则后患无穷。之后，父亲被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聘请为“近代财经史研究组”顾问。在中央充分调查旧中国外债的过程中，《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发挥了重要的资料文献作用。以



1955—1956年间，经济所顾问苏联专家阿·毕尔曼（1排左2）与经济所部分人员合影。其中2排右2为徐义生，2排左3为于光远

□ 怀念师友

后，在国际公法、国际私法领域专家的参与下，聘请律师，打赢了湖广铁路债券民间索赔案，制止了其他想拿旧中国债券向我国索赔的案例，为国家避免了巨额财政损失。

五、终曲

父亲年轻时一帆风顺地做了政治学的名教授。院系调整后是“王小二过年”，还要夹着尾巴做人。他在年轻同事和学生面前特别当心，生怕别人说他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他希望自己的孩子都从事理工科，踏踏实实多做实际工作。好在“反右”运动中父亲发言较少，加上国家对科学院的特殊政策没有被打成“右派”。我们三个孩子都上了大学，大姐学医，二姐和我学了工科。父亲的自尊心很强，家庭观念比较重，如果不是为了孩子，“文革”中他是不可能不甘屈辱挺过来的。

1973年高校招生按录取人数四倍推荐，文化考核中张铁生交了白卷，我在安徽和县考了第一，被合肥工业大学拖拉机设计制造专业录取，父亲非常高兴。我插队当了近5年知识青年，25岁才进了大学门，还算是当时的幸运儿。可是程度不齐，教材太差，还经常出去开门办学。父亲说当时的大学就是干部培训班，哪里是做学问。

父亲常和我们说人年轻时多吃些苦没有关系，怕的是老了吃苦，人要芝麻开花节节高才快乐。有一段时间电视上放清宫戏很多，父亲很反感，说怎么还总是宣传皇帝一人之下全是奴才？他对吃吃喝喝也非常反感，总和我们说结交酒肉朋友是最没有用的。

1991年春节前，父亲在家煤气中毒。

当时我正与解放军105医院（当时合肥市唯一有高压氧舱的医院）神经外科合作科研项目。105医院的病房与高压氧舱离得较远，往来要经过室外，本来就是2月冷天，又来了寒流，结果父亲染上大叶性肺炎去世。

父亲生前表示要把骨灰撒掉，但两个姐姐坚决不同意。1998年清明，我们父母合葬在合肥市大蜀山烈士陵园，与许多安徽高级知识分子相伴。

父亲一生受老清华传统影响，只做学问，不去做官。他自己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总是教育我们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也是一个有很多爱好的人，喜欢打太极拳，唱昆曲。在合肥时，晚上常在教工球场看星象，在家搞篆刻。他是中国科学院唯一被降级的研究员，对于名利他早已看淡了，他只是希望能用他的知识多为国家做些工作。父亲做学问非常认真，自己收集资料，严格核对数据，一丝不苟。虽然他专研的公共行政在1949年后未能得到重视，但改行后所从事的外债史研究为国家避免了大额的外债赔偿，也为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是，看到自己清华理工科同学的大量的论文和成果，父亲内心还是很痛苦的。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那些在科学院工作的同学都受邀请去参加清华校庆，他说不知道他还算不算校友。后来安徽省清华校友会成立，邀请父亲作为第一老前辈在会上发言，父亲非常高兴。

父亲去世后，安徽大学送上挽联“学贯中西 经国文章存史册；行同日月 一生正气在人间”，我想这是对他一生最好的概括。

（文中照片由董杰提供）